

实事求是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

李明友 何建华

【内容提要】“实事求是”是以中国语言规范表达的、凝聚着中国人智慧的理性思维方式,体现了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色。在新的历史时代,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对传统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在致思出发点和运思方法上进行了扬弃和改造,使“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具有科学性、时代性,成为凝聚着中国人智慧、体现中国气派的现代辩证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最重要成果。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改造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获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重要启示,即必须站在现时代实践发展和思维发展的水平上,积极吸取现代思维发展的积极成果,坚持思维方式变革和主体性原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注重现实生活、讲求从客观实际中寻找规律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为中国人民概括总结出来的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它既是中国思维方式中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中國化,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发展的视角,认真考察毛泽东“实事求是”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现代辩证思维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利于我们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地把握“实事求是”的内在含义,在实践上更加自觉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对于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实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事求是”是以中国语言规范表达的、凝聚着中国人智慧的一种理性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思维发展中,它不仅是一种踏实的治学态度,更是一种求实与求是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河间献王刘德(汉景帝之子)喜好古书,常常“广搜博讨,以求善本”,所以班固赞扬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可见,“实事求是”原指一种踏实的治学态度,后人讲“实事求是”也多从这个意义讲的。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代乾嘉汉学训释经义,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胡适针对“五四”以后学术界整理国故的方法如校勘、训诂等提出:“实事求是。莫作洞人”(《古史辨》第一册第191页);郭沫若针对胡适的主张,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指出:“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求‘其所以是’”,主张在治学中要坚持批判地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治学态度。自古而来的各种实事求是概念,尽管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主张,但都蕴涵着从客观事实出发寻找事物的本来面目,对客观实际作出正确判断的思维意向,代表了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际和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更是一种传统思维方式。近代曾国藩曾经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古训,本河间献王实事实

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乎？”（《曾文公全集·日记》）曾国藩说这段话是要把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汉学的“实事求是”说互相联系起来，调和宋学和汉学，目的在于强调要经世致用，做“明理有用之人”，为他的“理学经世”的思想寻找依据，然而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实事求是与传统哲学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传统思维方式，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以客观事物为出发点，以天道、地道、人道为基本内容，以经验直观为基本方法的思维方式。它在中国古代已获得了相当高的思维水平，体现了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色。

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把理性发展形式化、具体化的致思趋向不同，在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中，几乎所有的理性认识都是以大量的对生活、实践的经验观察和经验体验为基础的。《周易》坚持“有象必有理”的原则，采用“以象观理”的思维方法；老子用水的形象和特性来说明道的特点，他的“数与无舆”、“柔弱胜刚强”等含有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和智慧的命题，都是对自然、事物、人生变化的经验总结；墨家强调在注重“耳目之实”的基础上“察类明故”；而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更是主张“格物致知”，“事必躬躬”表现出明显的注重实际、实践，着眼于现世和人事，注重现实生活经验的务实精神。这种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到明清之际发展到了顶峰，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戴震为代表的批判思潮，在以气为本、以实为尚、以器为先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下，进一步开创了从具体事物入手，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循事见理，因物为心，尽器求道，下学上达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法。他们认为，“盈天地万物者气也”，理只是气的“条理秩序”，人的思维要认识和把握道理，便只能通过对具体事物（气之实）的切实研求来获得，通过实际的操作，“格物”、“尽器”，做事等“践迹”的工夫来达到，中国哲人所强调的这种从客观事物出发认识事物规律性的思维方法，对于中华民族养成“重实际黜玄想”的思维习惯具有重要意义，从而避免了西方传统思维把理性形式化、具体化，建立“上帝之城”的偏颇。

当然，任何思维方式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尽管达到了相当高的思维水平，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时代精神和智慧的象征，难以满足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于精神和理性的需要。随着东西文化大规模接触和交流的历史进程的展开，中西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交汇和融合，特别是现代西方逻辑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传播，对中国理论思维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扎根，这种崭新的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改造，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改造和进步集中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实事求是这一传统思维方式推进到现代水平。

二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经过一番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从而概括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思维方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处、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

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改造,不仅在概念上使实事求是由治学方法上升到哲学思维方式,实现了治学方法与世界观的统一,而且具有科学性、时代性,使实事求是这一思维传统在现时代得到了扬弃和发展。作为一种现代思维方式,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科学性、时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来看,从实际出发,这是传统思维方式和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共同的致思出发点。如前所述,传统思维方式注重实际,注重客观事物,主张“务实求真”。毛泽东也十分强调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把从实际出发作为实事求是基本要求。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继承了传统思维中的优良传统,找到了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内在契机。然而,“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同为从实际出发,“实际”这个致思出发点却有着不同的时代特色。

“实事”(或实际)作为实事求是的出发点,它不仅是认识的开始,而且本身也是认识的产物。对实事的不同看法,反映着传统思维方式和现代思维方式的代差异。按照中国文字的本义,“实事”或“实际”都是指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实事”是指独立存在于研究者的意识和意志之外的一切真实的东西,因而“实事”实际上是一个与物质同等程度的甚至外延上比物质更大些的概念,它具有客观性、辩证性、整体性等特点。毛泽东的“实事”明确地继承了这个中国特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现实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23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因而在“从不依赖研究者的意识和意志之外的真实情况出发”这一点上,毛泽东与传统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然而在“实事”的广度和深度上,毛泽东的实事概念与传统思维方式相比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他在对中国革命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坚持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统一,从世情与国情相互结合的实际出发,进行考察和研究。他首先力图把握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并认清中国的国情,认为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同时,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已经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的历史现实,毛泽东又把中国的问题置于国际环境,从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在加以考察,从而全面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这种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总趋势出发来把握国情,从世情、国情出发来把握省情、县情的思维视角,是马克思主义现代辩证思维方式的基本出发点,体现了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一致性,体现了世界历史时代国际交往和地区交往的普遍化,是以国际交往地区交往的普遍

发展为背景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近代门户开放以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古代中国,在华夷本末文化观念支配下是不可能具有这种气派和视角的。

因而,在世界历史发展体系中考察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又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注意世界历史的辩证统一中考察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二是从思维方式的运思方法来看。人们按一定方式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实质上也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和控制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维主体用各种思维工具和手段,用思维的框架,结构和方法对输入的感性材料进行分解,加工和改造,从而创造出社会性的精神或观念产品而输出来。在思维活动中,主体形成某种固定的转换程序、运行方向,以及固定的思维结构和逻辑的格,而所有这些当为人们所普遍接受、采用,成为人们思维普遍遵循的转换方式时,就形成了特定时代的思维方式。因而在思维活动中使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工具、手段),遵循怎样的思维框架。思维路线是揭示思维方式水平的本质方面。从实事出发如何求是,在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采取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思维路线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从实事出发的前提下,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以经验直观的方法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与西方哲人历来重视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研究,逻辑思维在整个学术思想研究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思维传统不同,在中国,逻辑思维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作用为丰富的形象思维和直感思维所冲淡。传统思维方式既不热衷于逻辑的推理和论证,更不屑于进行逻辑的思辨,而是把一切诉诸于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经验直观。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十分强调在感觉经验基础上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倡导“薄天官,缘耳目”,进行“格物致知”。朱熹曾提出格物致知的两条途径,认为要格物致知,一要“即物穷理”,“而今只用就事物上格去,……端身正坐,以观物之来,便格也”;二要参研推究,“须是仔细参研方得,此便格物穷理。”所谓参研,即是通过比较分析以把握理,认为“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朱熹这种格物致知说,客观上接触到了认识过程的某些环节,他所说的“即物穷理”,含有对事物广泛考察之意,因而不无可取之处。特别是朱熹把分析方法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认为只有经过“铢分毫析”才能把握理,这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缺乏由分析到综合的逻辑工具,很难真正上升到理论,从而使他的认知论,泛滥于经籍书册,难免有支离之弊,多少表现出烦琐哲学的倾向。正是这一点使正统理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逐渐失去生机和活力,为主张简易工夫的陆王心学所批判。由于传统思维发展中忽视了逻辑思维,缺乏严密的形式思维系统,使得中国传统思维一直停留在类比性思维和经验性思维上,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之中,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思维方式的发散和深化。

在新的历史时代,毛泽东依然十分重视实际这个致思出发点,十分重视感觉经验在思维活动中的基础作用。但他没有停留在经验直观的思维水平上,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遵循现代辩证思维由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具体的基本原则,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了根本改造,从而把实事求是这一传统思维方式推进到现代水平。

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思维的作用。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黑格尔、列宁

的哲学著作,并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思维方法论》,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等书作了详细的批注。在这些哲学批注中,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辩证思维方式特别是其中的由具体——抽象——具体这一运思方法的重视。如毛泽东在读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理论》一书时对以下段落文字表示关注:“我们若想科学地分析事物,便要从那事物的最简单的范畴进行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复杂的东西,不会一下子就可理解,那要先尽可能地分解成简单的东西,把它们一一加以研究,然后综合这些简单的东西去理解其全体,只有采取这种次序才行”,“最具象的终点和最余象的始点,都成为直接的东西现实地表现出来,而余象的东西,就成为具有丰富的多面性的具象自身的某一面现实地表现出来”。“这种场所出现的终点依存于始点,它不是现实的依存,乃是思维上的依存。所以,从最余象的范畴上升到具象的东西去的思维过程,绝不是具象的东西它自身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88~489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思维是一个包含有这样两条思维发展道路的思维过程,“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选集》第2卷第103页)也就是说,理论思维只有经过不断地由感性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才能“把可以看得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语),从而获得感性经验中未提供的关于本质的规律的认识,真正克服由一时一事的经验上升到“规律”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在思维活动中,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再现的过程,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逻辑学的专门著作,但留下了《论持久战》的逻辑。在这本军事著作中,毛泽东首先根据中日战争10个月的感性材料,抽象出持久战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定——“问题的根据”,作为全部中日战争的逻辑起点,然而,又由此出发,逐步生长出中日战争的一切本质方面,从而把“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思维具体完整地再现出来;最后达到持久战的逻辑起点——“结论”。全文气势恢宏,结构严谨,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由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方法的博大而精彩的画卷。

由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在致思出发点和运思方法上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扬弃和发展,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辩证思维方式实行了有机的结合,使实事求是成为凝聚着中国智慧、体现中国气派的现代辩证思维方式。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三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结合,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传统思维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新生体,是凝聚中国人智慧、体现中国气派的现代辩证思维方式。它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认真总结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扬弃和发展,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思维方式的发展必然包含着对已有的思维传统的改造。思维方式具有时代性,某种思维方式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思维方式,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也就成为历史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一

一旦成为历史的思维方式,就会内化为民族思维传统,形成某种封闭性的思维圈,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角度、思维线路、思维框架所固定的思维定势。即使时代向前发展了,思维的传统力量并不会随之消失,相反,它仍在现实的思维方式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着作用,或者变形纳入到新的思维方式,或者成为新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甚至对立的思维方式,因而历史总要积淀于现实的,某种新的思维方式本身是从历史的思维方式发展而来的;但新的思维方式又必须抛弃思维传统梦魇般的影响,如果让传统的力量占据主要地位,思维就会失去活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人们愈来愈深切地感到观念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统率各种具体观念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则是最根本的观念变革,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将是一代人、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改变。因而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发展不仅是一个生产方式的改造和发展问题,也有一个思维方式的改造和发展问题。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改造和发展的理论、实践中,我们可以获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重要启示。

首先,要实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必须站在现时代思维发展的水平上,积极吸取现代思维发展的积极成果,以获得思维方式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毛泽东在对实事求是思维方式进行改造和发展时,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为依据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巨大宝库,也是现时代理论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体现了现代思维方式发展的水平。我们是在现时代自觉地进行思维方式变革,因而必须站在现时代思维发展的高度来自觉地吸取现时代科学发展中的思维成果,掌握现代科学思维的基本方法,尤其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实现我国思维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其次,要实现思维方式现代化,必须坚持思维方式变革的主体性原则,认真反思并扬弃我们的思维传统,以找到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内在契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改造和发展,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思维方式水平上的,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语言规范所表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思维传统的扬弃工作本身表明,思维方式总是有一定主体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是这一主体进行自组织自改造的过程。任何学习都是自主立场上的学习,都是有选择、有分析的学习,其他民族的思维成果及其发展趋势,只能作为我们民族思维方式发展的尺度和参照系,不能简单照搬。要真正发展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反思我们自己的思维传统,寻找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内在契机。扬弃我们的思维传统。因而,在思维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十分注意思维方式的主体作用。

再次,要实现思维方式现代化,必须把思维方式变革与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以获得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在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现代辩证思维方式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结合观,他对实事求是的改造和发展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根本动力的催化剂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他当时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既不是从传统出发,也不是从马列既成的经典理论出发寻求印证或演绎发挥。因而,思维方式变革的根据,内在于现实的社会实际生活,要变革思维方式就必须面向当代的社会实际生活,从社会变革的实际生活中吸取营养,领悟新的时代精神。同时,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存在的基础,思维方式的变革总是以

(下转 46 页)

22页,第85页,第363页,第86页,第83页,第87页,第292页,第86页,第339—340页,第292—293页,第393—394页,第204页,第188页,第414页,第364页。

①《湘乡精舍章程》。

②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见《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

③《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1917.8.23。

④《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5号。

⑤《论语类抄》。

⑥毛泽东:《讲堂录》。

⑦扬昌济:《达化斋日记》。

⑧⑨⑩《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3页、第23页、第22页。

www.cnki.net



(上接 39 页)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为“绝对必需的前提”的。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活动的改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造和扬弃传统思维方式。要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真正走向现代化,要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一个根本的变革,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使传统思维方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变革传统思维,实现思维方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扬弃的过程,我们应该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改造和发展为典范,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发展的水平上,认真反思自己的思维传统,努力把思维方式的变革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紧密结合起来,把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纳入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